

利瑪竇的中文著作簡述

張西平*

本文分別從“已經公佈的利瑪竇文獻”，“尚未發現的利瑪竇文獻”，“利瑪竇與人合作的文獻”三個方面，對四百年來利瑪竇中文著作的出版情況做了系統的梳理，同時對其三本重要著作的形成和發表做了深入的個案分析。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馬切拉塔城人。1582年8月入華，1610年5月11日病逝於北京，在華生活二十八年。利瑪竇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中國基督教之父，西方漢學的創始人。四百多年來，中國學術界一直在不斷地發掘和整理他的著作。本文對利瑪竇中文著作的出版情況以及近年來新的研究情況做一簡要介紹。

在中文文獻中已經公佈的利瑪竇文獻

利瑪竇一生著述豐富，但他生前並未系統整理和出版自己的著作。崇禎元年（1628）李之藻編《天學初函》，將利瑪竇的《交友論》、《天學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辯學遺牘》、《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等十部著作收入其中。這大概是第一次較為系統的整理和出版利氏的著作。

崇禎三年（1630），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撰寫《大西利先生行記》，文中講利瑪竇著譯有《四書》（拉丁文）、《交友論》、《坤輿圖》、《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幾何原本》、《測量》、《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義》。

康熙四十六年（1707），黃百家撰寫《明史》的〈意大利傳〉時，介紹了利瑪竇的生平，提到他的《萬國全圖》。

《四庫全書》共收錄西學書二十二部，其中利瑪竇的書七部。它們是《乾坤體義》、《測量法義》、

《測量異同》、《勾股義》、《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幾何原本》。《四庫全書》存目中所著錄的西學書共有十六部，其中有利瑪竇的著作五部，它們是《辯學遺牘》、《天主實義》、《畸人十篇》、《交友論》、《二十五言》。⁽¹⁾至於明清間中國士大夫在各類叢書中所收錄的利瑪竇著作、地圖更是多不勝數，無法一一列舉。⁽²⁾

1965年《天主教東傳文獻》作為由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中的一種在臺灣出版，書中首次公佈了利瑪竇的重要著作《西國記法》。

利瑪竇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1613年由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帶回歐洲，經他整理翻譯後以拉丁文出版，書名為“天主教由耶穌會傳入中國史，採自利瑪竇日記，五卷，作者比利時金尼閣”⁽³⁾，從此後不僅該書的拉丁文版不斷被再版，而且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德文版、英文版也都先後出版。在此期間利瑪竇的《天主實義》也被Charles Jean-Baptiste Jacques 譯為法文版。⁽⁴⁾

1909年耶穌會的塔基神父（P. Pietro Tacchi Venturi）在耶穌會檔案館發現了利瑪竇的意大利文

*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及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漢學》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

原稿，他分別於1911、1913年出版了兩卷本的原意大利文稿。⁽⁵⁾1942-1949年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M.D'Elia S.J.）將利瑪竇的原稿Fonti Ricciane加以整理、注釋出版了《天主教傳入中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e Christianita Nella Cina*），其中第三卷是附錄和索引。德禮賢還於1939年出版了以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1601年利瑪竇的地圖為底本的《坤輿全圖》。⁽⁶⁾

近年來在利瑪竇著作和文獻的整理與翻譯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1981年王綿厚在他的〈利瑪竇和他的兩儀玄覽圖簡論〉⁽⁷⁾一文中，首次公佈了他所發現的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李應式刻於1603年的《兩儀玄覽圖》。⁽⁸⁾1982年林金水首次翻譯了利瑪竇的部分文獻。⁽⁹⁾1983年中國大陸的中華書局出版了由何高濟、王遵仲、李申根據1953年英譯本所譯的《利瑪竇中國筭記》。1986年尹斌庸發表了〈《西字奇跡》考〉，他根據藏於梵蒂岡圖書館的一手文獻，首次釐清了關於利瑪竇用羅馬字母注音漢字的文獻問題。⁽¹⁰⁾1986年中國臺灣光啟出版社出版了由劉俊余、王玉川、羅漁所譯的《利瑪竇全集》，前兩卷為《中國傳教史》，後兩卷為《利瑪竇書信集》。⁽¹¹⁾1996年有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所編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在臺灣輔仁大學出版，該書在第一卷首篇公佈了利瑪竇的重要文獻《齋旨》。⁽¹²⁾1999年張西平發表〈《天主教要》考〉，考證了藏於梵蒂岡圖書館和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幾個《天主教要》的版本，認為其中一本為利瑪竇所定稿。⁽¹³⁾1999年9月任繼愈所主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該書在第216頁首次公佈了《中國天主教教義》一文的手稿的圖錄，並注明為利瑪竇所作。在2001年朱維錚先生所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分別在香港和上海出版。2002年在臺灣利氏學社所出版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的第一冊中，首次公佈了利瑪竇的重要文獻《聖經約錄》。

至今尚未找到的利瑪竇的文獻

四百多年來，儘管學術界和宗教界在不斷努力

收集和整理利瑪竇的文獻，但至今仍有一些文獻尚未發現，需要我們及後人繼續努力。根據我的有限閱讀，至少有以下幾個文獻：

1) 關於《交友論》。利瑪竇《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中曾經說：“另一本書則是以中文書寫，書名為《交友論》。……這本書是以拉定文而中文對照而寫，更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後來贛州區域知縣蘇大用出版中文單行本……”⁽¹⁴⁾在1599年8月14日致高斯塔的信中說：“神父，你曾表示希望得到些中國東西，因此把我四年前所編譯的《論友誼》一書中的數頁，隨這封信一起給你寄去……其中附有意大利文說明，祇是不如中文流利。”⁽¹⁵⁾德禮賢經過多方考證，利瑪竇這個意大利文本藏於格列高利教皇大學檔案館（Archives of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ms.292），由於文獻珍貴曾於1825年、1877年、1885年、1910年多次重印出版，德禮賢也於1952年將其再版一次。⁽¹⁶⁾這裡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利氏1599年寄回的中文和意大利文中的格言祇有七十六條，而在1601年版中格言已有一百條，如馮應京在序言中所說“交友論凡百章”。這說明《交友論》有不同的版本，他所說的中文和拉定文的對照本始終沒有發現。

2) 關於《中文拼音辭典》。利瑪竇第一次進北京失敗後，在返回南京的路上，他和郭居靜等神父一起編寫了一部供傳教士學習漢語發音的辭典。他說：“神父們利用這段時間編了一部中文字典。他們也編了一部中文發音表，這對傳教士們學習中文有很大幫助。”⁽¹⁷⁾這部文獻雖然前輩學者一直在努力尋找，也曾發現過一些線索⁽¹⁸⁾，但至今仍未發現。

3) 利瑪竇所譯的《四書》。利瑪竇在多封信中明確說他翻譯了《四書》，並把它寄回了歐洲，如他在1594年11月15號的信中說：“幾年前〔按為1591年〕我着手翻譯著名的中國《四書》為拉定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理格言集，充滿卓越智慧的書。待明年整理妥後，再寄給總會長神甫，歷時你就可以閱讀欣賞了。”⁽¹⁹⁾這本書至今下落不明，美國學者孟德衛認為，這本書在中國長期被作為入華耶穌會士的中文課本，並成為後來柏應

理 (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 等人所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底本。⁽²⁰⁾ 這祇是一種意見，我個人認為這本書的原稿是會找到的，因為利瑪竇明確說過，他寄回了羅馬。

利瑪竇與人合作的文獻

利瑪竇自1582年8月進入澳門到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1588年11月25日回歐洲，在六年多的時間裡，他是以羅明堅的助手身份出現的，這樣他必然參予了羅明堅的一些文字工作。例如，羅明堅把他的《天主實錄》在1583年校完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鄧蕓潤飾”⁽²¹⁾；又如為給羅明堅準備一份教宗致明朝皇帝書，“利瑪竇在肇慶府與一些學界朋友合作，用中文寫好一篇教皇的詔書”⁽²²⁾。如果以上兩篇文獻利瑪竇主要以助手身份出現的話，那麼在《葡華辭典》中他則以合作者的身份出現。⁽²³⁾ 雖然這些文獻都不是利瑪竇獨立完成的著作，而且他發揮的作用也不是主要的，例如，2001年在澳門，葡萄牙東方基金會出版了利瑪竇和羅明堅合著的《葡華辭典》的影印稿，這部作品肯定是由羅明堅帶回羅馬的，而且他發揮的作用很可能比利瑪竇大些。⁽²⁴⁾ 但這些文獻仍是我們研究利瑪竇的重要文獻。

關於《天主實義》

關於利瑪竇的《天主實義》第一版出版時間學者們一直沒有一致看法。有人認為第一次出版是1595年⁽²⁵⁾，有人認為是1596年⁽²⁶⁾，有人認為是1603年⁽²⁷⁾。“1595年說”尚無任何根據，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史》中說他1595年12月到南昌，並未提到《天主實義》的出版。⁽²⁸⁾ “1596年說”的依據是金尼閣版的一段記述，“大約在這個時刻，利瑪竇神父修定了他的教義問答，把它增補、整理得好像是出自文人之手。它的讀者不再像過去那樣用憎厭可惡的和尚名稱，或者書中所談論的宗教崇拜了。新版出現時，舊印本就被燬版和拋棄了。”⁽²⁹⁾ 意大利文原版的內容是“從此，大家便可以使用新

書，待印出之後即可分發給所有教友，就像以後所做的那樣。”⁽³⁰⁾ 這裡並未說已出版，而祇是講“待印出之後”，因而利瑪竇1596年所完成的祇是手稿，並沒有出版。⁽³¹⁾ 利瑪竇在1596年10月13日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也明確說：“撰寫已久的《天主實義》目前正在校正之中。希望這本較以前的更好。一些我們的朋友看過其中幾章，認為不錯，曾力勸我們快去印刷。”⁽³²⁾ 這說明1596年《天主實義》並未正式出版。“1603年說”的根據是利瑪竇在出版《天主實義》時所寫的〈天主實義引〉，落款是“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利瑪竇書”，即1603年。但這祇能說明〈序〉寫於1603年，並不能證明書的正式出版也是在1603年。真正經過上級審定後的正式出版是1604年，這點利瑪竇當年的書信可以確證。利瑪竇在1605年2月給馬塞利神父的信中說：“去年（1604）在這裡出版的《天主實義》……”⁽³³⁾ 在這一年，他在幾封信中多次講到1604年出版了《天主實義》一事。⁽³⁴⁾

上面講的是利瑪竇同意後《天主實義》第一版的出版時間，若從《天主實義》實際出版時間來看，最早的應是馮應京的1601年版。⁽³⁵⁾ 關於1601年版方豪所說的，“仍以無臥亞主教許可，利瑪竇拒絕刊行”⁽³⁶⁾，並沒錯。在臥亞主教批准以前，利瑪竇對文人刊印他的書是採取默認態度的。⁽³⁷⁾ 這就是說我們應弄清1601年版和1604年版之間的關係，前者是文人自行刻印、利瑪竇默許的版；後者則是經上級審定後，利瑪竇自己刊行的版。

1605年（萬曆三十二年）廣東重刻，“乃專為日本用者，序文及中縫均用《天主實義》名，但扉頁則作‘《天學實義》，西國利先生著，燕怡堂藏版’，日本帝國大學圖書館有藏本。”⁽³⁸⁾ 1607年10月5日汪汝淳重刻於杭州。同年李之藻也重刻於杭州，他在重刻序中說：“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³⁹⁾。這說明汪刻本在前，李刻本在後。

這樣我們看到1601年（萬曆三十一年）至1607年（萬曆三十五年）《天主實義》共刻四版：第一版馮應京版（1601），第二版利瑪竇親定版（1604），第三版汪汝淳重刻版（1607），第四版

李之藻重刻版（1607）。（40）

《天主實義》重刻本很多，利瑪竇在1605年7月26日的信中說，“《天主實義》用中文撰寫的，去年重版……”（41）這說明出版的當年就重刻了一次。以後范禮安三次重刻於澳門，巴爾迪諾蒂（Baldinotti）兩次重刻於柯枝（42），1629年（崇禎二年）李之藻將其收入《天學初函》。“此外尚有燕貽堂四板，無年月；福建敬一堂板；乾隆四十七年（1782）收入四庫全書。同治七年（1868）上海土山灣重刻；光緒二十四年（1898）獻縣板；光緒三十年（1904）土山灣活字第一板，民國十九年再板；二十二年獻縣板，二十七年山東袁州板；及滿文、安南文、朝鮮文、蒙文、法文等譯本，及三十年朱星元田景仙合編之文言對照本。裴氏所漏列者尚有北平西什庫救世堂、重慶聖家堂、香港納叻助靜院諸板”。（43）實際上可能還有更多的刻本，我們尚不知道。例如比利時漢學家杜鼎克最近在臺灣發現了周獻臣在1607年（萬年三十五年）所寫的〈天主實義序〉。（44）

我們這次依據1601年版為底本，參照李之藻的《天學初函》本進行互校。

利瑪竇的《天主實義》決非一時即興之作，而是他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化不斷認識的結果，正如他所說的，“這是我多年辛苦的結晶”（45）。《天主實義》是在羅明堅的《聖教天主實錄》一書的基礎上改寫的。兩本書最大的不同在於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在《聖教天主實錄》中，羅明堅以“西僧”自稱，而《天主實義》已自覺把自己定位於“西儒”。這個轉捩點是利瑪竇在范禮安的要求下研讀《四書》，並將它譯為拉丁文，時間是1593年12月。（46）利瑪竇一邊翻譯《四書》，一邊寫作《天主實義》。（47）1594年他譯完了《四書》（48），1595年決定放棄“西僧”稱號，並正式着儒服。1596年10月利瑪竇完成《天主實義》初稿，這個手稿開始在中國文人中流傳。同時，他將中文稿譯成了拉丁文稿，以便送給在澳門的日本教區主教Dom Luis Cerqueira 和范禮安審查。當1598年7月16日孟三德（Duarte de Sande, 1531-1600）帶着范禮安等人

的修改意見從澳門來到南昌時，利瑪竇已於1598年7月16日離開南昌前往北京。不久孟三德病故，直到1601年利瑪竇進入北京後，他才拿到此修改稿。

（49）而在這個修定稿正式於1604年出版以前，利瑪竇又將這幾年間與中國士大夫的重要談話改編後收入《天主實義》之中。這些談話後來被利瑪竇同時收入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畸人十篇》，並於1608年（萬曆三十六年）出版。（50）另外，在這次修改時他在第七章還吸收了他過去與佛教的幾次討論。

這說明《天主實義》實際上是利瑪竇1604年以前思想的一個總結。

關於《交友論》

1) 《交友論》的寫作時間

《交友論》是利瑪竇入華後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利瑪竇第一次提到它是在1596年10月13日給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他說：“去年曾致力用中文試撰《交友論》一書……”（51）這說明該書寫於1595年。現存的馮應京刻本最後有一句話“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年，三月望日，大西洋修士利瑪竇集”，但利瑪竇在《交友論》中說：“今年春時，度嶺浮江，抵於金陵”，這說明他不可能在1595年三月完成此書。因為此書他是在1595年末獻給建安王的，而“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年，三月望日”則是1595年4月24日，方豪和德禮賢都認為“三月望日”屬於刻版筆誤，根據“同年陽曆十一月四日利氏上總會長書尚未提及《交友論》，是年陽曆十一月四日為陰曆十月三日，十月望日合陽曆十一月十六日，尚不能稱為‘年終’，故知必為陰曆十一月望日即陽曆十二月十五日，亦即推算利氏完成《交友論》最遲之可能日期……”。（52）德禮賢也認為《交友論》應完於1595年12月15日。（53）

2) 《交友論》的刻本

《交友論》的第一版是何時刻的？這個問題尚無定論。方豪根據瞿汝夔的序言中所說在南昌時他祇是“籍有錄之”，即他是抄錄了此書，說明不可

能有1595年的南昌刻版，他認為瞿汝夔所說的“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表明瞿氏希望早日將《交友論》刻印成書，這樣方豪認為“‘友論’之始刻或即在此年”，即《交友論》第一版最早也是在瞿氏做序的那年，萬曆己亥（1599年）。⁽⁵⁴⁾ 德禮賢認為方豪否認有1599年以前的刻本是不妥的，他認為《交友論》“第一版是蘇大用在甯都於1596年初印製的”⁽⁵⁵⁾，利瑪竇是用中文和拉丁文對照寫的，蘇大用刻本是僅有中文還是附有拉丁文，不得而知，因這個刻本未流傳下來。⁽⁵⁶⁾ 因為利瑪竇是在1596年10月3日在給總會長信中，第一次明確講到該書，而書末的落款表明他是在1595年未定稿的，因而德禮賢的說法較為可信。筆者所以傾向於德禮賢的意見還有另外兩個理由：其一利瑪竇本人在《中國傳教史》中已講明了此事，說明了蘇大用的刻本是在他完稿後刻印的⁽⁵⁷⁾；其二方豪認為瞿汝夔在他序中的話表明這個序祇是他自己抄錄本的序，而不是刻本的序。從瞿汝夔的序來看不足以證明這一點，瞿汝夔說“今利公其彌天之資，匪徒來賓，服習聖伙，以我華文，譯其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籍有錄之，以備陳風採謠之獻，其為國之瑞，不更在 失白雉百累之上哉。”這裡說的是利氏從西文書中摘錄有關友論的格言，而不是說瞿氏抄錄《交友論》。方豪認為瞿氏所說的“籍有錄之”中的“有”字有誤，應改為“籍而錄之”，這個理解不合原意，這裡的“有”是指在西方的書中有類似的格言，利瑪竇抄錄下來。顯然方豪這個論證較為勉強，而且這個說法和瞿汝夔在序言最後所說的“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顯然矛盾，瞿氏最後這句話表明他是為一刻本做序，而不是為自己的抄錄本做序。他為《交友論》寫的序，題為“大西域利公友論”，這個刻本時間是“萬曆己亥正月穀旦”，即1599年1月27日。這個刻本也未流傳下來。利瑪竇在1599年8月14日致高斯塔神父的信中說：“我不曾把它印刷，也不能印刷，……但在兩處由別人印刷過，甚受學者的喜愛。”⁽⁵⁸⁾ 以後，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史》中曾說，1599年初在南京時，明朝的官吏祝世祿和著名學者李贄都讀到了《交友

論》⁽⁵⁹⁾，祝世祿和李贄讀的是哪個刻本不可而知。德禮賢認為利瑪竇所說的“在兩處由別人印刷過”，這兩處是1596年的寧都版和1599年1月的南京版。⁽⁶⁰⁾ 甯都版是蘇大用刻的，南京版很大可能就是瞿汝夔的1599年版，很遺憾這兩個版本都軼失了。⁽⁶¹⁾

目前保留下來最早刻本是馮應京在萬曆辛丑春正月八日，即1601年2月9日所刻的版。利瑪竇在1596年10月13日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說：“去年曾致力用中文試撰《交友論》一書，……為使該書更具有權威，我還請大官馮應京寫一序言，後贈送給皇帝的親屬建安王。……尤其我的至友（按即馮應京）未曾告訴我便刻版印刷了，上面也刻了我的姓名。”⁽⁶²⁾ 這段話很重要，但方豪和德禮賢都未加注意。它引出兩個問題：第一，利瑪竇送給建安王的抄錄本上就有馮應京的序，這個序和以後他1601年版的序是否一樣？第二，在1596年寧都版和1599年南京版以外還應有一個盱眙版，而且刻版時間也在1596-1601年之間。這個版在哪裡？這兩個問題都無法回答，因這個版同樣軼失了。目前馮應京1601年的刻本藏於羅馬維多利亞·愛瑪孥愛圖書館（Biblioteca Vittorio Emanuele 編號72，c，467，1）。德禮賢最早發現了這個刻本，在馮應京序言前有“臨川付相刻”五個漢字。經德禮賢和方豪的討論後認為，這個本子刻於江西臨川，刻工為傅相。⁽⁶³⁾

《交友論》除單刻本以外，還被許多叢書收入，這些叢書有《天學初函》、《寶顏堂秘笈》、《一筆存》、《廣百川學海》、《山林經濟籍》、《說郛續集》、《堅瓠秘集》、《古今圖書集成交誼典》、《朱翼》等，另外《小窗別紀》收有節本，《鬱岡齋筆》收有刪節後的潤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雜家存目引有《交友論》四則，《徐氏筆精》引用二則。1948年葉德祿以《天學初函》中的《交友論》為底本，參照各叢書本和節本做《合校本交友論》，發表在《上智編譯館館刊》三卷一期，以後又在三卷五期上發表全文，後出單行本。1936年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以“友論”為名收入其中。1997年齊魯出版社出版的《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中“雜家類”第93冊收入《天學初函》本的《交友論》一卷。

我們的點校本以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交友論》為底本，編號為Jap Sin I 49。我們這個底本和德禮賢所看到的羅馬維多利亞·愛瑪孥愛圖書館的本子略有不同，按照德禮賢的介紹利瑪竇“在這一個版本上蓋了兩枚耶穌會的印章，一枚是橢圓的，一枚是方的。”⁽⁶⁴⁾據他分析這個本子並不是利瑪竇自己刻的，因為馮應京曾將自己印的《交友論》和印版一起送給了利瑪竇⁽⁶⁵⁾，利瑪竇祇是用馮應京的版重印了一遍，並蓋上耶穌會的章。因此，德禮賢看到的本子是利瑪竇親印的，而耶穌會檔案館這個本沒蓋耶穌會的章，但兩個本子都是明萬曆辛丑春正月八日所刻，實為一個刻本。方豪根據葉德祿的研究認為“《天學初函》本實優於馮刻本”。⁽⁶⁶⁾

3) 《交友論》的內容

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最早在北堂圖書館發現了《交友論》的部分西文底部⁽⁶⁷⁾，這就是安德烈亞斯·埃博倫西斯(Andreas Eborensis) 1590年在巴黎出版的《格言與訓試》(Sententiae et Exempla)一書⁽⁶⁸⁾，經過他多年努力在《交友論》的100條格言中有88條都找到了出處。方豪在此基礎上將德禮賢這一成果介紹到中國，於1954年在國立臺灣大學學報《文史哲學報》第六期上發表題為“利瑪竇交友論新研”⁽⁶⁹⁾的長篇論文。從此國內學者對《交友論》的內容有了更深入瞭解。

利瑪竇在1599年8月14日致高斯塔的信中說：“神父，你曾表示希望得到些中國東西，因此把我四年前所編譯的《論友誼》一書中的數頁，隨這封信一起給你寄去。……其中附有意大利文說明，祇是不如中文流利。”⁽⁷⁰⁾德禮賢經過多方考證，利瑪竇這個意大利文本藏於格列高利教皇大學檔案館(Archives of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ms.292)。由於文獻珍貴曾於1825年、1877年、1885年、1910年多次重印出版，德禮賢也於1952年將其再版一次。⁽⁷¹⁾這裡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1599年寄回的中文和意大利文中的格言祇有76條。而在1601年版中格言已有100條，如馮應京在序言中所說

“交友論凡百章”，這說明《交友論》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內容。

《四庫全書總目》在談到《交友論》時說“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為利害而言，醇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仇者過訾之害，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無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為友，不應一富一貧，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⁷²⁾然王肯堂在《鬱岡齋筆塵》中卻說：“有味乎其言之也，病懷為之爽然，勝枚乘七發遠矣！”僅此足見《交友論》在明清之影響。

關於《二十五言》

《二十五言》是利瑪竇的一部重要作品，主要內容是介紹基督教倫理學。他在1605年2月寫給羅馬馬塞利神父的信中說：“在此小冊子中我祇談修德養性，如何善用光陰，完全以自然哲學家的口吻論事，不攻擊任何宗教，當然呈現天主教倫理的色彩。”⁽⁷³⁾徐光啟認為這本書所介紹的道理“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之大快也”⁽⁷⁴⁾。馮應京則認為《二十五言》中的修身事天之道，不像佛教那樣空談，其道理高於佛教的四十二章經，“其視蘭臺四十二章，孰可專用，當必有能辨之者”⁽⁷⁵⁾。

《二十五言》寫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而不是費賴之所說的萬曆三十二年(1604)⁽⁷⁶⁾，理由有二：其一，徐光啟在跋中說：“此二十五言成於留都”，“留都”即當時的南京，而利氏入北京前曾三次到南京，祇到1599年才真正在南京安居下來，所以德禮賢在其《利瑪竇年譜》中說：“在南京以中文撰寫《二十五言》。”⁽⁷⁷⁾其二，他在1605年2月寫給羅馬馬塞利神父的信中也說：“一位被視為活聖人的官吏〔按即馮應京，字茂岡或慕岡〕，過去曾修過不少廟宇，而且又相當輝煌。他曾把我的一本小冊子重新刻版印刷，由於共分二十五篇，故取名‘二十五言’。”⁽⁷⁸⁾這說明1604年馮應京作

跋的《二十五言》祇是第二版。

《二十五言》後來被王肯堂收入他的《鬱岡齋筆塵》第三卷中，將其更名為“近言”，實際上他祇收了《二十五言》中的十四條。⁽⁷⁹⁾李之藻在編《天學初函》時將它收入〈理篇〉。《四庫全書》將它收入“存目”之中，並說：“西洋教法傳入中國，亦自此二十五條始，大旨多剽竊釋氏，而文辭尤拙。”⁽⁸⁰⁾

尚有爭議或暫時不能確定的文獻

還有一些文獻歸屬尚不能完全確定，或者祇是最新的發現和研究，在學界尚未形成共識，但在研究中又不能忽視的。這類文獻有以下幾個：

1)《經天該》。有關利瑪竇著作中爭論最多的是《經天該》，關於這份文獻有四種意見，一種認為該文獻是利瑪竇撰⁽⁸¹⁾；一種意見認為此文是利瑪竇撰，李之藻譯⁽⁸²⁾；一種意見認為《經天該》為薄珏所作⁽⁸³⁾；最新的意見是根據該書內容中沒介紹南極星座這一特徵，認為《經天該》不可能是利瑪竇或李之藻所做，因為他們都具有全天的宇宙觀，不可能漏掉南極的星座。⁽⁸⁴⁾

2)《天主教要》是利瑪竇的一份重要文獻，為完成這份文獻使其成為中國各教堂的基本材料，他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利瑪竇曾寫過並多次修改過《天主教要》，這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⁸⁵⁾研究者也都注意到這份文獻⁽⁸⁶⁾，近年也有人對此做過專門研究⁽⁸⁷⁾。杜鼎克(Adrian Dudink)最近發表論文，談了他的意見，並做了考證。⁽⁸⁸⁾對這篇文獻的版本、內容的看法學術界尚未統一意見，仍在討論之中。

3)《理法器撰要》此書為抄本，署名作者為“利瑪竇”。朱維錚先生已將其收入他所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之中。⁽⁸⁹⁾朱先生在此文的簡介中認為“我們難以否認這部抄本中包含利瑪竇的未刊稿”⁽⁹⁰⁾，鑒於此，此文獻收入了該書中。

4)《中文天主教教義》。1999年9月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一書，在這本書的第216頁公佈了一篇署名利瑪竇的文獻，其目錄的內容如下：Fragments of a

Catholic Catechism in Chinese 中國天主教教義(意)Matteo Ricci S.J.撰。1588年拉丁文、滿文稿本，殘存2頁。高38.5釐米，寬25.5釐米。雙語對照部分中，拉丁文橫向書寫，漢文則依中國古籍傳統習慣豎向書寫。”⁽⁹¹⁾

這篇文獻筆者在1993年時就已經看到過，但因一些問題尚存疑慮，沒有動筆提及。1998年我和美國漢學家魏若望一起曾對文獻做過分析，並請他對文獻的字跡做了考察。鑒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已經正式公佈了這份文獻，我撰寫了〈〈利瑪竇的佛教經文〉初探〉一文，並將此文提交給了2001年在北京理工大學所召開的“相遇與對話——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國際討論會”⁽⁹²⁾。關於這篇文獻目前在中文文獻中尚未有人討論，如何鑒別這篇文獻還需要學術界深入討論。

當我們談到利瑪竇的中文著作時還應看到，利瑪竇的不少中文著作是由他和中國文人合作而成，如他在《幾何原本》的序中說“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乃多闕略，了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吳下徐太史先生來。太史既自精心，長於文筆，與旅人輩交遊頗入，私計得與對譯成書不難。”在這個過程中正是一個“口傳”，一個“筆受”，兩人“反復輾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政，凡三易其稿”，才最終成書。這說明《幾何原本》應是利、徐二君共同努力的結果。同樣的情況還有《渾蓋通憲圖說》，《四庫全書》收入子部“天文演算法類”之中。書中說《渾蓋通憲圖說》為“明李之藻撰”，而李之藻在序中則說“昔從京師，識利先生，……示我平儀，其制約渾……耳受手書，頗亦鏡其大凡。”說明此書仍是利氏口授，李氏筆演。《同文算指》亦是“西海利瑪竇授，浙江李之藻演”。與此相同的還有：《測量法義》、《勾股義》、《圓容較義》等書。我們所以指出這一點，旨在說明這些著作雖都收入《利瑪竇全集》之中，但實際上是利瑪竇與明代文人的共同成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

以上我們總結的祇是有關利瑪竇的中文文獻出

版情況，關於以西方語言形式對利瑪竇的出版和研究，本文不作展開⁽⁹³⁾，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意大利2001年所出版的新的版本的《利瑪竇書信集》中公佈了幾封新發現的利瑪竇書信。⁽⁹⁴⁾

2001年是利瑪竇進北京400週年，為紀念這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偉人，北京、香港、羅馬分別召開了國際學術討論會。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展開，對利瑪竇的研究也會向縱深發展，而對其文獻的發掘與整理則是一切研究展開的基礎，他所留下的這些著作無論是對東方還是對西方都是一筆重要的思想文化遺產。

【註】

- (1) 不含已收入《天學初函》中的利瑪竇著作。
- (2) 洪煥蓮：〈考利瑪竇世界地圖〉，陳觀勝：〈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禹貢》第5卷第3、4合期；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 Dudink）著、孫尚揚譯：〈簡明末清初耶穌會著作在中國的流傳〉，《史林》1999年第2期。
- (3) De Christiana Expeditio Ne Apvd Sinas Svscepta Ab Societatis Iesv, Ex. P. Matthaei Ricij eiusdem Societatis Comentarjjs. Auctore P. Nicolao Trigaltio belga. 現代學者已經考證，金尼閣對利瑪竇的原著做了較大的改寫，為在當時的禮儀之爭中替入華耶穌會的傳教政策辯護，他有意對利瑪竇的原文做了刪改。
- (4) 參閱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p.193. London, 1987.
- (5) Opere del P. Matteo Ricci, edite a cura del comitato per le onoranze nazionali con prolegomeni note e travol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Macerata, Premiato Stabilimento tipografico, 1911-1913. 第二卷收錄利瑪竇部分重要信件。
- (6)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Citta del Vaticano 1939.
- (7) 此文收入《遼寧省博物館學術論文集》中。
- (8) 王綿厚：〈論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覽圖上的序跋題識〉，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
- (9) 林金水：〈《利瑪竇日記》選錄〉，《明史資料從叢刊》，1982年，第2期。
- (10) 尹斌庸：〈西字奇跡考〉，《中國語文天地》，1986年第2期；〈利瑪竇等創建漢語拼寫方案考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 該譯本是以利瑪竇的意大利文為原本翻譯的。
- (12) 此文後附〈司鐸化人九要〉，並公佈這兩個文獻的兩個不同版本。
- (13) 張西平：〈《天主教要》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四期。
- (14)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頁255，臺灣光啟社，1986年。
- (15) 《利瑪竇通信集》，頁258，臺灣光啟社，1986年。
- (16) P.M.D'Elia, "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1956), pp.356-377.
- (17)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頁286，臺灣光啟社，1986年。
- (18) 尹斌庸先生對此文獻有詳細介紹，《學術集林》，第一輯，頁349，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9) 《利瑪竇書信集》，頁143，臺灣光啟社，1986年。
- (20)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p.247-297, Stuttgart 1985.
- (21) 張奉箴：《福音流傳中國史略》上編，卷二，頁613，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71年。裴化行（H. Bernard）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263，商務印書館1936年。
- (22) 裴化行（H. Bernard）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頁321，商務印書館1936年。這篇文獻的影印件刊登在張奉箴的《福音流傳中國史略》上編，卷二，頁12。
- (23)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1995年6月。
- (24) 參閱張西平文〈西方漢學的奠基人-羅明堅〉，《歷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
- (25) （法）費賴之著，馮承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41，中華書局1995年。
- (26)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頁212-21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27)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143，中華書局1989；周康燮主編《利瑪竇研究論集》頁59，香港崇文書店1971。
- (28) 向文靜頁碼，見她的譯稿第3卷13章。
- (29) 利瑪竇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筆記》，頁307，中華書局1983。
- (30) 向文靜，同4。
- (31) 僅此就可看出金尼閣改寫本與原本之間的差異。
- (32)(33)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頁231，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頁268。
- (34) 同上，頁277，284，292。參閱《方豪文錄》頁144，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
- (35) 這點林金水糾正徐宗澤把馮本說成1603年出版是正確的，參閱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頁213-214；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142。
- (36) 方豪《方豪文錄》，頁144，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
- (37) 利瑪竇在1606年8月15日給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說：“我所寫的四、五本書皆有中國人不得我同意就刻印去了，視察員神父曾謂讓他們去刻印，祇要把它們校正好就行。”見《利瑪竇書信集》，頁324。
- (38) 方豪《方豪文錄》，頁144。參閱吉田忠編《所在調查報告書》，頁49，東北大學文學部附屬，昭和63年3月。
- (39) 方豪《李之藻研究》，頁33，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40) 林金水認為“這四版有據可稽的是南昌本、馮應京本，利瑪竇1603年和1604年本”，《利瑪竇與中國》頁215。
- (41) 《利瑪竇通信集》頁515。
- (42)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41。
- (43) 方豪《方豪文錄》頁145。
- (44) Adrian Dudink, A previously Unknown Preface(1607) by Zhou Xianchen to Ricci's Tianzhu Shiyi,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VI-1994, p.19-36.
- (45)(46)(47)(48) 《利瑪竇通信集》，頁515；頁135；頁139；頁

- 143。
- (49) Fonti Ricciane, II, p. 292.
- (50) 被改編後收入《天主實義》的談話有：1601年同李戴的談話；1603同馮琦的談話；1601年同李之藻的談話；1600年同吳中明的談話；1605年同龔道立的談話；1595-1598年在南昌同一位文人的談話。
- (51) 《利瑪竇通信集》，頁231，臺灣光啟社，1986年。
- (52)(54) 方豪：〈利瑪竇交友論新研〉，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頁1853；頁1850。
- (53) Pasquale M.D'Elia, S.J., "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1956), pp.356-377.
方豪：《利瑪竇交友論新研》，見《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850，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55) Pasquale M.D'Elia, S.J., "Further notes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1956), pp.356-377.蘇大用，字體齋，寧都人，當時任英德知縣。見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交遊一覽表〉，載《利瑪竇與中國》，頁29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 (56) 費賴之認為1595年《交友論》第一版刻於南昌，在地點與時間上都與利瑪竇所記載的不符。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42，中華書局，1995年。方豪認為費賴之“殆誤以成書之年為刻書之年”的批評是對的，見方豪：〈利瑪竇交友論新研〉，《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850，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57) (缺)
- (58) 《利瑪竇通信集》頁258，臺灣光啟社，1986年。
- (59) (缺)
- (60) 參閱Pietro Tacchi Venturi, S.J.,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J." II, p.248; Pasquale M.D'Elia, S.J., "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 (1956), pp.356-377.
- (61) 按照德禮賢的觀點，利瑪竇可能終生都沒親自刻印過《交友論》，但由金尼閣的拉丁文本轉譯為英文的書卻說《交友論》的第一刻本是利瑪竇自己，“就在它付印後不久，贛州有一位知縣完全用中文把它加以重印。”見《利瑪竇中國節記》頁301，中華書局，1983年。由此可見金尼閣本和意大利文本的差異。
- (62) 《利瑪竇通信集》，頁231-232，臺灣光啟社，1986年。
- (63) P.M.D'Elia, "Il tratto sull' Amicitia. Primo libro scritto in cinese da Matteo Ricci S.J. (1595.)", *Studia Missionalia* 7 (1952), pp.449-515; Fang Hao,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4(1949-1955), pp.574-583.
- (64) Pasquale M.D'Elia, S.J., "Further note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1956), pp.356-377.
- (65) 參閱Pasquale M.D'Elia, S.J., *Fonti Ricciane*, Roma, II No.626.
- (66)(69)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852，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67) 參閱德禮賢，Fonti Ricciane Roma I, p.369.利瑪竇在1596年10月13日的信中明確說：“去年曾致力用中文試撰《交友論》一書，是從我們的書中挑最好的作為參考而編寫的，其中引用許多歐洲名人的遺訓或名言……”（《利瑪竇通信集》第231頁，臺灣光啟社，1986年），但他並未指出引證了甚麼書。
- (68) P.M.D'Elia, "Il trattato sull' Amicitia Primo Libro scritto in cinese da Matteo Ricci S.J.(1595).Testo cinese. Traduzione antica(Ricci) e moderna(D'Elia). Fonti-Introduzione e Note", *Studia Missionalia* 7(1952), pp. 449-515.
- (70) 《利瑪竇通信集》，頁258，臺灣光啟社，1986年。
- (71) P.M.D'Elia., "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1956), pp.356-377.
- (72) 《四庫全書總目》，上冊，頁1080，中華書局，1995年。
- (73) 《利瑪竇通信集》，頁268，臺灣光啟社，1986年。
- (74) 徐光啟：〈跋二十五言〉，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29，中華書局，1989年。
- (75) 馮應京：〈重刻二十五言序〉，見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29，中華書局，1989年。
- (76)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42，中華書局，1995年。
- (77) 〈利瑪竇年譜〉，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冊，頁1575，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78) 《利瑪竇通信集》，頁268，臺灣光啟社，1986年。
- (79) 參閱1934年《聖教雜誌》9月第23期。
- (80) 《四庫全書總目》，卷125，子部，雜家類存目二，中華書局，1995年。
- (81) 梅文鼎：《中西經星同異考》，《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演算法類一，頁901，中華書局1995年。
- (82) Loui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頁53，商務印書館1936年；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4頁末有《經天該》字樣。查Pfister法文原著，在利瑪竇著作的第十六種同樣無《經天該》字樣，見法文版頁39。王重民在《善本書籍經眼錄》中已明確指出，1936年版的《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頁53的《經天該》字樣完全是馮承鈞自己加上的，法文原版並無此內容。
- (83) 梅文鼎：《中西經星同異考》，吳省蘭：《藝海珠塵》卷十一。以上三種意見方豪在《李之藻研究》第七章〈李之藻撰經天該考實〉中已有詳細介紹，商務印書館1936年。
- (84) 薄樹人：〈明代天文學史上的幾個問題〉，趙令場、馮錦榮主編《亞洲科技與文明》，頁142-149，明報出版社1995年。
- (85) 利瑪竇在1605年5月9日的信中十分明確地說了他修定《天主教要》一事。羅漁譯《利瑪竇通信集》頁278-279，臺灣光啟社1986年。
- (86) 羅光：《利瑪竇傳》頁177-179，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82年。
- (87) 張西平：〈天主教要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 (88) Mr. D. Mungello (editor) *Sina-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0002, p.38-51.
- (89) 此書為大陸第一本利瑪竇著作的現代點校本，它有復旦大學出版社版和香港城市大學兩個版本。
- (90) 見上書頁694。
- (91) 《中國天主教教義》中的“中國”可能是圖書館的誤筆。
- (92) 此文不久將在澳門《中西文化》上發表。
- (93) 參看Nicolas Standaert (edit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Brill 2001.
- (94) 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Edizione realizzata sotto la direzione di Piero Corradini. A cura di Francesco D'Arelli, Prefazione di Filippo Mignini con un saggio di Sergio Bozzola, 2001 Quodlibet.